

晚清 国粹 派



——文化思想研究

郑师渠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晚 清 国 粹 派

——文化思想研究

郑师渠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郑师渠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5 重印

ISBN 7-303-02138-8

I. 晚… II. 郑… III. 文化流派，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7459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875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625 字数：340 千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2 版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册

定价：17.00 元

序

本世纪初，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以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其指导思想为民主主义，具体为孙中山归结的三民主义。但是，在革命发展过程中，革命党人内部意见不一，思想杂陈。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国粹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流播。这两种思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不同程度地产生过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国粹思想趋向保守，无政府主义则是过激。然而，历史现象又是复杂的。国粹派的主要人物章太炎曾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的一些作品有着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另一个主要人物刘师培更为突出，他既大力宣传国粹，又狂热鼓吹无政府主义。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来衡量，刘师培既是保守，又很激烈。换句话说，是既偏右，又极左。这种现象，在近代中国并不罕见。就刘师培来说，他的无政府主义最终归于复古主义。他和章太炎一样，都跟孙中山、同盟会闹分裂，而且走得更远，乃至变节

投靠清方。辛亥革命后，刘师培参加发起“筹安会”，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新文化运动兴起，他办《国故月刊》，以“国故”对抗新文化。从宣传国粹到鼓吹“国故”，虽不能等同视之，但其间自有一脉相承之处，而不是截然两概。刘师培的这种现象，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在近代中国，不仅封建势力顽强地存在着，封建思想意识也浓厚地笼罩着社会。即如自称“激烈派第一人”的刘师培，仍然具有浓厚的封建思想，他的无政府主义不免带有封建性的特色。这就是“死”的拖住“活”的。

这里无意也不可能对国粹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作全面的论述，只不过是之引发的片断感言而已。国粹思潮是清末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学术界对它虽有所研究，但不够系统、全面，评价也不一，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对这股思潮简单地予以否定，并不符合历史实际。至于怎样的评价才恰当，不仅是史实问题，还有认识问题，方法论问题，甚至有感情问题。所谓感情问题，就是说研究者对他的研究对象往往容易偏爱，带着感情色彩而影响了客观性。研究历史要在实事求是，从历史实际出发。当然说起来容易，做到并不容易，需要努力求索。

郑师渠同志在考虑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时，有感于晚清国粹思潮的历史意义和研究的不足，确定以此作为研究的课题。他从收集原文献入手，查阅了《国粹学报》、《政艺通报》等20余种当时出版的报刊，参考和利用了近百种其他文献，用力颇勤。在完成论文撰写并通过学位答辩后，又作了必要的修改、润饰，成为这部著作出版，应

该说基础是扎实的。书中的内容涉及国粹派和国粹思潮的兴起，国粹派的文化观，国粹派的经学思想、史学思想、伦理思想，国粹思潮的历史地位和局限性等等，是目前研究国粹派及其思想的一部较系统、全面的著作。对于这诸多方面的问题，作者都是在丰富史料的基础上逐一加以详细阐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所创获。有些论断或提法，研究者和读者未必都赞同，亦属正常。百家争鸣，各抒己见，有助于研究的问题趋于符合历史实际，有利于学术的发展。

龚书铎

1992年10月9日

校庆九十周年

前 言

20 世纪最初十年，是经庚子之役创深痛钜之后，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空前高涨的重要时期。与此相应，晚清的政治格局和文化思潮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动。就前者而言，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对立迅速激化和排满革命风潮洪波涌起；就后者而言，则集中表现为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日趋激烈地否定中学、追求西学的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态势发生了变异，社会文化心理呈现出向传统文化回归的新态势；而国粹派和国粹思潮的崛起，正是其重要的表征。

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诸人为代表，晚清国粹派一身二任，既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翼，又是一批精通国学的学者。作为排满革命派，国粹派有别于一般党人，不仅擅长藉经史为革命酿造激情，而且更关切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他们看到了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一致性，相信文化危机是更本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因此提出“保种、爱国、存学”的口号，呼吁人们重视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他们不仅孜孜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而且鲜明地提出了以固有文化为主体，积极整合西方文化，发展民族新文化具有前瞻性的新思路；作为学者，国粹派也不同于传统士人，而具有共和革命者的立场、情思即时代感。他

们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某些理论与方法，运用于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在“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和“古学复兴”的名义下，身体力行，有力地推进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化。要言之，国粹派及国粹思潮的崛起，实从一个侧面鲜明地彰显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动及其相互交感的时代品格。因此，国粹派及国粹思潮的出现，决非如某些论者所说，是封建地主阶级复古思潮在革命派队伍中的顽强表现；而应当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在传统的学术文化领域的延伸。同时，也惟其如此，研究国粹派及其国粹思潮，不仅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的重要课题，而且，我们对于辛亥革命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理解，也可缘此获致进一步的深化。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国粹派及国粹思潮的研究，是很不够的。这在大陆地区，尤其是如此。70年代以前，大陆学者发表的有关研究成果，总共只是一篇文章而已，可见寂寞之甚。邓实是国学保存会的主要创始人和晚清国粹派学术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柳亚子先生称赞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有关他生平稍稍完整的资料，我们甚至迄今都很难找到，同样也反映了这一点。不惟如此，学术界对国粹派虽然缺乏研究，但长期以来却持论苛刻，贬多于褒。大致到80年代初为止，大多论者总难忘情于将国粹派及国粹思潮，说成是封建复古思潮在革命派队伍中的顽强表现，最终予以贬斥。80年代初出版的两种在国内有重要影响的大型辞书，不约而同，都仍将“国粹”一词作保守贬意的注释，足见定势思维，影响之深。近些年来，随着近代文化问题开始为人重视，情况才有了转机。相关的研究成果增加了，许多论者也开始注意打破传统思维，客观评价国粹派的正面价值。这也是十多年来思想解放的潮流促进史学繁荣和发展的又一征候。但从总的说来，对国粹派及国粹思潮的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这不仅表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而且还表现在系统研究的著作，尤其尚付阙如。

国粹派所以为国粹派，说到底，是因其提出了独特的文化理论和主张，在 20 世纪初年别树一帜，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之，无论人们或臧或否，国粹派的文化思想毕竟是构成其历史地位的主要基石。其优长集中于斯，其失误也主要集中于斯。本书拟在系统考察晚清国粹派崛起的历史机缘及其新学知识系统的基础上，对国粹派的文化思想，包括文化观、史学思想、伦理思想、经学思想，作具体深入的研究。并力图在 20 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动的大背景下，为之定位，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但因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著者学养有限，本书的不当和错误之处，实所难免。敬祈读者指正。

著 者

1992.8

目 录

序言

前言 1

第一章 晚清国粹派的崛起

- 一 从“国粹”一词说起 1
 - 二 国粹派的界定 7
 - 三 国学保存会的成立 9
 - 四 晚清国粹派的崛起 17
-

第二章 国粹派及国粹思潮出现的历史原因

- 一 20 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 28
 - 二 国粹派出现的原因 39
 - 三 国粹派的学术渊源 46
 - 四 中、日国粹派出现的历史机缘之异同 52
-

第三章 国粹派的新学知识系统

- 一 国粹派知识结构的特点 62
 - 二 进化论的宇宙观的确立 68
 - 三 社会学理论的吸纳 82
-

第四章 国粹派的文化观

- 一 国粹、国学、国魂 111
 - 二 “无用者君学也，而非国学” 120
 - 三 “古学复兴” 132
 - 四 中西文化观 139
-

第五章 国粹派的史学思想

- 一 中国传统史学不足“当意” 162
 - 二 “己既能破，亦将能立”
——国粹派关于新史学的探索 170
 - 三 系统探讨中国古代学术史 191
 - 四 通史致用，助益革命 208
 - 五 努力保存史籍文物 222
-

第六章 国粹派的伦理思想

- 一 “性有体用”的自然人性论 238
 - 二 “群重己轻，舍私为公”的道德观 250
 - 三 主张建立“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新型的
伦理关系 260
-

第七章 国粹派的经学思想

- 一 “夷六艺于古史” 276
 - 二 革命与改良、古文与今文 286
 - 三 《春秋》研究 299
-

第八章 国粹派的历史地位

- 一 辛亥后国粹派的落伍 319
 - 二 国粹派的历史地位 324
-

附录一：

- 一 拟设国粹学堂启 339
- 二 拟国粹学堂学科预算表 342
- 三 拟设国粹学堂简章 344

主要参考书目

附录二：

- 晚清国粹派论孔子 350
- 晚清国粹派论清学 363
- 刘师培史学思想略论 382
- 章太炎、刘师培交谊论 399

后记

再记

第一章 晚清国粹派的崛起

一 从“国粹”一词说起

“国粹二字，于古无征”^①。“国粹”，这 20 世纪初年风行一时的新名词，本非中国所固有，而是舶之于日本。黄节在《国粹学社发起辞》中说：“国粹，日本之名辞也。吾国言之，其名辞已非国粹也”^②。可见，晚清国粹派的出现，最初是受到了日本的影响。所以，日本的国粹思潮曾是怎样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最早又于何时传入中国？这些显然都是研究晚清国粹派及其文化思想首先必须正视的问题。

日本的国粹思潮最初出现于明治中期，其缘起是对明治政府片面推行“欧化”政策的反拨。

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迫使日本订立了不平等条约，从此日本也陷入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1868 年明治维新开始之后，日本政府即争取修改不平等条约；但它迎合西人关于日本“不开化”、“没有资格修改条约”的说法，力倡“欧化”、“洋化”，积极推行“欧化主义”的政策。外相井上馨的“名言”是：“要使我国化为欧洲的帝国，要使我国人化为欧洲的人民”^③。在

首相伊藤博文与外相井上馨倡导下，政府化了三年时间，于1883年在东京建成了一座专门用以接待外国客人的迎宾楼，取名“鹿鸣馆”。达官贵人于此举办化装舞会，花天酒地，沸反盈天，由是形成了一个“欧化”的“鹿鸣馆时代”。日本明治维新的主流，固然是主张学习西方、促进社会的近代化；但它在推进的过程中，又明显地出现了不顾国情，一味模仿西方文化的狂热倾向，以至于有人公然提倡改换日本人种，废除日本文字，改行罗马字母，鼓吹全盘西化。上述所谓的“鹿鸣馆时代”，正是此种消极思潮泛滥的时期。这种情况引起了社会广泛的不满。1888年（明治21年），三宅雪岭、志贺重昂、井上丹了等人发起成立政教社，刊行《日本人》杂志，倡言“国粹保存”，以与之相抗。日本的国粹思潮便由是发端。

志贺等人在论及《日本人》旨趣时说：“长久以来，大和民族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它玄妙地孕育出自己独有的国粹（Nationality），此一国粹在日本本土发展，随着环境而有不同的回应。从孕育、出世、成长到发扬，经过不断地传承与琢磨，它已经成为大和民族命脉相系的传国之宝”^④。耐人寻味的是，“国粹”一词也并非日本独创，而是从英文“Nationality”一词翻译来的^⑤。英文“Nationality”的词义是：“民族”、“民族性”、“民族主义”、“独立国地位”。政教社同人大体上正是在原来的词义上使用国粹一词。他们认为，日本岛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在“不知不觉间”化育了大和民族。国粹就是日本民族的“民族性”、“特性”，它是“顺应大自然法则的产物”，因而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存在。日本独特的国粹，“即国家民族独立的体系”^⑥或叫“民族精神”、“民族精髓”。尽管日本国粹派对国粹未曾有严格的界定，但他们明确地反对将神道、佛教、儒学或是其他宗教、哲学视为日本的国粹。一般说来，他们认为国粹是：（一）一种无形的民族精神；（二）一个国家特有的遗产；（三）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性^⑦。

国粹思潮的出现，反映了人们对西方列强侵略威胁的警惧和对日本民族独立地位的执著追求。国粹论者是民族主义者，但不是锁国论者。他们反对的是政府盲目的“欧化”政策，而非其“欧化”的本身。三宅作为东京大学哲学馆的学生，不仅对培根、笛卡尔、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备极尊崇”，而且“毕生敬重西乡隆盛”^⑧，是明治维新的热情拥护者。志贺同样“热衷于欧美”。他倡言“实学”，与福泽谕吉并无二致^⑨。他们与一般欧化主义者的不同在于，他们强调“欧化”不应当是生硬的全盘照搬，应是基于“民族和国家的特色为媒介”而产生的“日本的开化”。志贺把国粹比作人体的胃脏，认为“欧化”必须通过日本文化自身的机制来实现，从而明确地把自己的主张与守旧派区分开来：“我辈决非死守日本传统的守旧分子，而只是想把西方的开化输进来，用日本国粹的胃脏来咀嚼消化它，使其同化于日本身体之内罢了”^⑩。

在东西文化观上，政教社诸人反对一味贬斥东洋文化的偏见，相信各民族互有优劣。三宅写了《真善美日本人》一书，肯定日本国民的长处；但同时又写了《伪恶丑日本人》一书，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当代日本人的缺点。他们相信，人类文化发展只能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各国文化应当是异彩纷呈的“浑一”，而不应是僵死单调的彼此同化。三宅在《真善美日本人》一书封面上的题词是：“发扬民族特色，裨补人类的发展”。他说：“为自己国家尽力，就是为世界尽力，发扬民族的特色是裨补人类的发展，护国和博爱为什么要对立起来呢？”^⑪

许多日本学者对明治中期的国粹思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与德富苏峰的平民主义双峰并秀，同为当时思想界带来了“新风”。例如，鹿野正直说，国粹主义是一种具有独到见解的“近代化的构想”。在欧化风潮滔滔之际，三宅等人提出东西洋“浑一”的哲学观点，是“一个伟大的创举”^⑫。1981年出版的

《明治精神の构造》一书的作者松本三之介也指出，政教社同人强调“发扬民族个性”，决非是“狭隘的排外主义”；相反，它反映了明治以来在“文化开化和欧美的新思潮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们”，对日本“民族性的自觉”。国粹主义者是“名符其实的富国强兵论者，是民族主义者”，同时他们反对明治政府日趋增强的专制主义，主张政治民主化，这与德富苏峰的平民主义又是相通的。因此国粹思潮具有广泛的社会性^⑬。

不过，日本的国粹主义在明治后期便逐渐走向反面。“大日本国粹会”于1919年成立时，已经是一个与军国主义结伴而行极端狭隘的排外主义的团体了。

日本国粹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当始于甲午战后中国留学生竞相东渡之时。1898年底，梁启超在横滨创《清议报》，曾将“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列为该刊四宗旨之一^⑭。这里的“亚粹”，显然是脱胎于“国粹”一词。1901年9月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说：“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终属空言耳”^⑮。据著者所知，这是梁本人也是国人第一次在报章上使用“国粹”一词。而正式讨论国粹问题，更要晚到1902年。是年4月，梁致书康有为，其中说：

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弟子意欲以挾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故极思冲决此范围。明知非中正之言，然今后必有起而矫之者，矫之而适得其正，则道进矣。即如日本当明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至近年然后保存国粹之议起。国粹说在今日固大善，然使二十年前而昌之，则民智终不可得开而已^⑯。

戊戌维新失败后，梁亡命日本，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

《新民丛报》。他猛烈抨击清廷腐朽和封建文化对国民的禁锢，一时思想日趋激进。其时他正撰述《新民说》，热衷于思想“破坏”；不过，他绝非“醉心欧化”论者。他肯定日本的“国粹说”为矫正之道，是“大善”；只是认为在中国倡此说，尚非其时罢了。然而，梁启超毕竟是多变的，是年秋天，他即转而拟办《国学报》，“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似乎又成了急切的国粹论者了。^{①7}

但梁启超的上述言论，仅见于私人信件。报刊上最早介绍日本国粹主义的文章，当是1902年7月《译书汇编》第五期上刊登的佚名者著《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一文。是文甚短，却相当清晰地勾画了日本两种思潮对垒的一般态势：

日本有二派，一为国粹主义。国粹主义者谓保存己国固有之精神，不肯与外国强同，如就国家而论，必言天皇万世一系；就社会而论，必言和服倭屋不可废，男女不可平权等类。一为欧化主义，欧化云者，谓文明创自欧洲，欲己国进于文明，必先去其国界，纯然以欧洲为师。极端之论，至谓人种之强，必与欧洲互相通种，至于制度文物等类无论矣。

作者显然是“欧化”论者。他认为，日本的国粹主义“即保守之别名”；进化无穷，“欧化”不止，遽言保守，只能故步自封。他且引申说，日本尚且如此，中国、朝鲜“其更当知所从乎”？作者对日本国粹主义的判断虽然并不切当，但他毕竟是第一次向国人公开传递了日本国粹主义的信息。

第一次将日本国粹主义向国人作肯定介绍的是黄节。同年12月30日，他在《政艺通报》上发表了《国粹保存主义》一文，其中说：